

改良主义者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

陈振江 李喜所

封建主义是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同的作用。如果说早期封建主义还曾起过进步作用的话，但是封建君主独裁专制主义则自始至终没有起过什么好作用。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皇位世袭、宗法等级森严；独裁专制的君主则极力推行个人独尊和愚民政策，在各个领域内无不是长官意志决定一切；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的晚清时代，封建主义、特别是封建专制主义更加严酷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因此，它早已成为社会的赘瘤，成为人民群众和进步思想家抨击的众矢之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出现后，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进化论的观点为思想武器，对封建主义和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从而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专制主义，也使中国人民的耳目为之一新。他们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揭露和批判，至今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本文仅就以下几个方面略加评说。

一、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是时代赋予新兴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先后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中国却还处在清朝反动腐朽的封建专制制

度的统治之下，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向外侵略、扩张，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对列强的侵略一再屈辱妥协，对内却极力维护封建专制的一统天下。

在封建统治集团中，除一部分人热衷于洋务活动，企图借助于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巩固封建统治外，其余大都是顽固守旧、昏聩贪残的封建顽固派。他们以大土地占有制为经济基础，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封建顽固势力对世界局势茫然无知，却又妄自尊大、抱残守缺，固守封建礼教的陈腐教条，抵制学习先进的西方，反对作一丝一毫的政治变革。

他们高唱“重农抑商”的老调，实则“毁农灭商”、破坏社会经济，阻止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妄图固守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范篱。

他们泥古不化、卑劣虚骄，好阿谀而恶直言，上下相蒙，而又一味粉饰太平，陶醉于歌舞升平的假象、迷恋于所谓“中兴”的美梦。

他们以天下为私，任人唯亲、唯“资”，并以科举、捐官败坏天下人才，而使吏治极端腐败，世风江河日下。

凡此种封建专制下的固疾，无不成为祸国殃民的症结。它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帮凶。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中国焉有不亡国灭种之理？因此，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挽救民族危亡，便成为当时先进中国人所面临的主要课题。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和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出现，产生了中国第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们大都由封建文人转化而来，早年或出国留学、或办理外交、或参与洋务活动、或投身于洋人的报馆，接触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他们痛恨外国侵略和清朝黑暗腐败的封建专制，忧国忧民，羡慕西方各国的富强，希望清政府作一些大刀阔斧的改革，使中国强盛起来，因此，我们习惯上称这批人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陈炽、陈虬、马建忠、汤震、何启、胡礼垣就是他们的代表。

早期改良主义者倡言进行政治、文化改革，要求变法自强，其中心思想是希望中国成为和西方一样的繁荣昌盛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这这一指导思想出发，他们发现了清朝封建专制制度的一系列弊病，并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予以大量地揭露和批判。尽管这些批判是支离破碎和极不彻底的，但他们毕竟是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的代表者，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因此，他们的呼声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也是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他们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犹如漆黑夜空中的点点繁星，给黑暗的思想界带来了一线光明，成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先声。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刚刚开始形成，力量还十分脆弱，所以早期改良主义者只是为挽救民族危亡和要求发展资本主义而发出一些呼喊，既未触及封建专制主义的本质，也未形成一个政治运动。因此，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主义依然故我。

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后，由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的传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日趋成熟。他们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也大大深化了。特别是清政府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的失败，以及马

关条约的签订，极大地刺激了改良主义者。也推动了他们政治思想的传播，发展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运动，即维新变法运动。在著名的改良派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努力下，把批判封建主义的斗争推向新的阶段。他们以历史进化论的学说和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为思想武器，刻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他们着重批判了君主专制政体，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从而动摇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动壁垒，为戊戌变法作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并给后来的民主革命学说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因此，它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史上，别开生面，占有着光辉的一页。

二、反对顽固守旧、妄自尊大、极力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

自鸦片战争以来，自称“天朝大国”的清朝封建统治者接连被所谓“蛮夷小邦”的英、法等国所击败，这不能不引起当时思想界的巨大震动。一些敢于正视现实的人勇敢地承认西方比中国先进，因而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要求。但是这种进步要求却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拒绝。顽固派像被了捅房窝的马蜂一样，杀气腾腾地向改良主义者反扑过来。他们把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正确思想视为“邪端异说”而大张挞伐。他们无视现实，空喊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①这种顽固旧守的思想在当时占有绝对的优势。甚至连1862年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

在北京办起了一所学习外语的学校——同文馆，也遭到了封建顽固派的攻击。1867年在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课，封建顽固派头子倭仁气得从马上摔下来跌了个半死。即使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清政府的许多官吏都“恶西学如仇。”①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有个官僚居然“上书言与洋人战不当用枪炮，当一切弃置而专用气。”②这些封建顽固派的昏话呓语，说明他们对世界局势懵然一无所知。但他们却一贯不肯承认清朝的落后，还梦想回到闭关自守的“天朝”时代。他们视外国的先进技术为“奇技淫巧”。他们惧怕学习西方会导致“用夷变夏”，动摇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封建政权。曾廉在其《蠡庵集》中写道：“西人言日大不动，而八行星绕之，……窥其用心，止以欲破我天地两大，日月并明，君臣、父子、夫妇三纲而已”。

封建顽固派这些迂腐的论调遭到了早期改良主义者的严厉痛斥。郑观应尖锐指出：“今之公卿大夫，墨守陈编，知古而不知今。”③并谴责他们“一事不为，而无恶不作”，“泥古不化”，“甘守愚陋而受制于人”。④王韬进一步斥责清朝封建顽固派官僚“至此时而犹作深闭固拒之计，是直妄人而已，误天下苍生者必若辈也。”⑤薛福成也明确地指出：处今日之世，“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⑥早

①《清史稿》，《徐桐传》。

②转见谭嗣同：《上欧阳瓣书·兴算学议》。

③郑观应：《盛世危言》卷1，《议院》。

④郑观应：《盛世危言》卷1，《学校》、《吏治》上。

⑤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1，《睦邻》。

⑥薛福成：《庸盦全集》，《筹洋刍议》、《变法》。

期改良主义者这些活的中心意思是批评顽固派泥古守旧、不识时务，终归是要碰壁的。他们指出，时代变了，形势变了，处于国际资本主义空前竞争发展的时刻，要想闭关自守，安于一隅，是绝对办不到的，“当今之时，处今之势，固非闭关自大时也。”^①

在批判封建顽固派闭关自守的错误主张的基础上，早期改良主义者进一步驳斥了所谓西学为“奇技淫巧”的论调，大声疾呼向西方学习。郑观应指出，如今“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这是讳疾忌医，“不求不学”，坐视国亡。事实上，西学“皆有益于国计民生，非奇技淫巧之谓也。”^②冯桂芬指出，清政府“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③既然不如人家，就应该向人家学习。“法苟不善，虽古先我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④冯桂芬在这里提出的向敌人学习的思想是明确针对封建顽固派以西方“蛮夷”是我仇敌作理由而绝不可拜其为师的谬论的。王韬进一步指出：“今日而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⑤其实，封建顽固派在反对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却又不择手段地向外国侵略者献媚来搏取西方大量奢侈物品供其

①王 韬：《弢园文录外编》卷2，《变法自强》上。

②郑观应：《盛世危言》卷1，《西学》。

③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上，《制洋器议》。

④同上书，《收贫民议》。

⑤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1，《变法》中。

享受。他们是一群不折不扣的伪君子。陈炽对此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说：“今之论者，动以奇技淫巧，诋斥泰西，而朝野上下之间，所用者触目皆是西人之物，不禁不革，仰给于人，力尽财殚，坐以待毙。”^①他还说，顽固派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倒行逆施，实暗保洋货之来源，暗绝华民之生路，不啻为泰西各国之人传翼而使飞扬，扬汤而使沸也”。^②这些封建顽固派表面上要和西方各国断绝来往，实际上暗地里勾结外国侵略者或以出卖国家权益来换取自己任意挥霍的洋货，而对国计民生真正有用的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学说则一概反对。陈炽在这里揭露的这种情况，确实道出了清朝封建顽固派既顽固腐化又放手卖国的本质。王韬讽刺这种黑暗腐败的政局说：“今观中国之所长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虚骄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财而彼此交征利，。”^③这种状况正是封建统治阶级腐朽本质的表现，也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必然产物。它严重地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早期改良主义者对封建顽固派这种揭露和批判，旨在为发展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扫清障碍。他们围绕着学不学习西方，搞不搞社会变革，同封建顽固势力大战了几个回合。虽然他们还未触及到封建专制的本质，但他们对封建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却打击了顽固守旧势力，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进取精神。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康、梁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异军突起，他

①陈炽：《庸书》外编，卷6，《赛会》。

②陈炽：《续富国策》卷3，《工艺养民说》。

③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1，《变法》中。

们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帜，义正词严地批判封建专制，明确地提出了变革社会和变法维新的纲领，从而把批判封建主义推进了新的阶段。

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反对封建礼教，要求变法和建立议会政治

早期改良主义者不仅驳斥了封建顽固派反对向西方学习的论调，而且提出只有改革封建制度、只有变法才能达到学习西方的目的。

两千多年来，封建统治者死守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条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立场。清朝封建顽固势力为了确保他们的既得利益，反对任何一点微小的变革，更仇视变法维新。他们一再强调“法制未可轻变”。曾廉在其《蠡庵集》中明确写着：“凡子孙欲革先人之法，其祸乱必尤甚于未革之世”。改良主义者对此作了针锋相对的反驳。王韬说：“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即使“孔子而处于今日，亦不得不变”。①“历代之法递变，一代之法亦递变”。这就如治病，病变药亦变，病变而药方不变，则病永不可除。如果当今在“宜变之时而不变，时将有不及变者矣；储能变之力而不变，力将有不能变者矣。”②郑观应讲得更为明白，他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千古无不敝之政，亦无不变之法”。③早期改

①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1《变法》上、中。

②汤震：《危言》卷4，《变法》。

③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考试》下。

良主义者这些论断集中于一点就是要变革，这种思想在清朝守旧顽固思想统治了当时思想界的沉闷时刻，是极为可贵的。它冲破了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揭示了变革是社会前进的公理，是挽救一国不致灭亡的关键。这是对封建顽固派固步自封、墨守成规的守旧思想的沉重打击。

改良主义者在认真研讨了西方社会制度后，认识到不变革清政府的封建专制制度，中国不可能象西方各国那样强盛起来。他们认为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是次要问题，而变革体制则是根本性的问题。郑观应说：“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轮，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乎”！①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大力抨击洋务派的所谓变革是“小变而非大变，貌变而非真变。”②是对西学“仅袭皮毛，而即嚣然自以为足”。③他们对洋务派这些批评，说明改良主义者的着眼点不仅仅在于办工厂、建学堂、修铁路、筹海防，而是要研究清朝制度的改革，效法西方各国，建立一套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治制度。从这点上看，他们不仅和封建顽固派对立，而且也 and 洋务派走着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改良主义者为挽救危亡，要求变法的呼声更高，变法的主张也完备和成熟了。以康有为、梁

①郑观应《盛世危言》卷1，《自序》。

②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7，《答强弱论》。

③王韬：同上书，卷1，《变法》上。

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吸收西方“进化论”的哲学观点，提出了较完整的改良主义变法主张。康有为批评了那种把变法仅限于办铁路、学堂、商务等具体事物的狭隘观点，认为这实际上只是“变事而已，非变法也。”^①他认为，仅作这些变革是无法挽救民族危亡的。康有为敏锐地指出：“而今国势危弱，至于危迫者，盖法弊使然也。”所谓“法弊”，就是指的封建专制制度弊病丛生，因此非作大的变革不可。康有为曾向皇帝大声疾呼说：“臣以为不变则已，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如果“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到头来“必至无功。”^②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则进一步地把抨击和改变君主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作变法为中心。梁启超指斥君主独裁专制权力无限，把国家作私产，视人民如牛马；而人民除了服役、纳税、当兵、喊万岁之外，别无一丝一毫的政治权力。这正是中国长期积弱、贫困落后和遭受侵略的根本原因。梁启超等人在封建专制极端严酷的时代却不顾杀身大祸，勇敢地向封建君主挑战，呼吁伸张“民权”，从而把批判封建主义引向了深入。他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学说为根据，提出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即“积民而成也”，国家应当是“国民之公器”，而不是“君相之私产”。^③但是历来的封建专制主义者无不“以国为一人之私产。”^④他指出：“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谭嗣同、

①②《戊戌变法》第1册，第440页。

③④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三，第73、74页。

严夏等人也都把历代的封建君主指斥为“独夫民贼”和“大盗”。这种淋漓尽致地批判是何等的尖锐和深刻啊！事实正是这样。历史上凡是热衷于搞封建独裁专制的君主，无不具有独夫民贼的特性和本质。谭嗣同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更激进、更猛烈。他除了痛斥和揭露封建君主专制的弊病之外，还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纲常名教制度。他指出：“……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①“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切矣。”^②他抨击封建君主“非有两鼻四目，而其力出于人也，亦果何所恃以虐四万万之众哉？则赖乎早有三纲五伦字样，能制人之身者，则能制人之心。”^③因此，他勇敢地提出要冲决封建纲常名教的网罗，希望通过变法废除那害人的礼教伦理制度。可见，他多少触动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本质，击中了一些要害；他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超过了其他改良主义者。

严复除了辛辣地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提出“重民抑君”的主张外，还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从而在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改良主义者，使他们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深刻而有力了。

改良主义批判封建专制制度，要求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求建立议会政治，让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因此，早期改良主义者破天荒地提出了在中国设议院的主张，并把它作为清朝一切制度改革的核心。

议院是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核心部分。敢于将这种制度

①②③《谭嗣同全集》第14、55页。

介绍到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了两千余年的中国，使人们知道在封建制度之外另有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不仅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而且需要不怕杀头的勇气。郑观应是第一个介绍西方的议院并建议清政府采取这种制度的思想家。他首先以令人神往的笔调把议院赞美的完美无缺，他说：“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故欲籍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他还说：“泰西各国，咸设议院”“而致富强。因此，设不设议院亦是中国强盛的关键。“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①马建忠在法国留学时还具体向国内介绍了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权组织形势，他说：“各国吏治异同，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催科不由长官，墨吏无所逞其欲；罪名定于乡老，酷吏无所舞其文。人人有自立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②对于当时的中国人士来说，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制度是十分新奇的，如果将其和清政府作一比较，西方的社会制度要百倍优越于中国的封建专制，早期改良主义者也只有异口同声地赞美了。他们认为中国如果富国强兵也必须效法英美，建立议会政治。他们同时具体设想了议会制度的实行办法，即在中央设议院，在

①郑观应：《盛世危言》卷1，《议院》。

②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2，《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

地方设“乡官”。“由百姓公举”产生。被选举的人“其年必足三十岁”，“其产必及一千金。”^①这明显地代表正在中国兴起的那些民族资产者的“富民”利益，反映了这些“富民”企图参与政权的要求。这当然也是对清朝封建专制政权的有力冲击。何启、胡礼垣的主张更为激进。他们不仅要求清政府设立议院，而且主张全面改革官制，实行责任内阁制。具体办法是把英国当时的政治制度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康有为等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则把“建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作为变法维新政纲的核心。

改良主义者用西方的议会制度去批判和取代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这是对封建专制主义一次空前的深刻批判和沉重打击。

四、批判“重农抑商”的陈词滥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

在批判封建顽固派反对变革的腐朽思想的过程中，早期改良主义者尤其揭露了顽固派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小农经济思想。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封建政权赖以生存的根基。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无论是开明者还是昏庸者都竭力维护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所以他们都是“重农抑商”的提倡者，是以“农为治国之本”的坚持者。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开始发展的时刻，清政府中那些封建顽固派更重弹起了“重本抑末”的老调，大叫“愚以为国家之制，在

^①陈炽：《庸书》内篇，卷上，《乡官》。

重本而抑末”。①有人更强调说：“伊古以来，国家殷富大利在农，为今之计，莫若重农。”②早期改良主义者的看法与此完全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富强之道在发展工商业，要以商为本，促进农副各业。薛福成认为，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有重要的作用，“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此其理从前九州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西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③郑观应指出：“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商业“有益于民，有利于国”。④他认为中国商业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重农轻商”的小农思想所造成的。因此他强调“欲振兴商务，必先俯顺商情，不强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不强以所答，而从其所乐。”⑤王韬在一篇文章中则就封建顽固派口头“重农”而实际“毁农”的表现作了十分深刻的揭露，他说：“遇拘之士，……重农而轻商，……呜乎！即其所言农事以观，彼亦何尝度土宜，辨种植，辟旷地，兴水利，深沟洫，泄水潦，备旱干，督农肆力于南亩，而为之经营而指授也哉？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听租，纵悍吏以殃民，

①曾廉：《蠡庵集》，《再答杨生子玉书》。

②徐致祥：《嘉定先生奏议》，《论时势折》。

③薛福成：《庸盦全集》，《海外文编》，《英吉利利用商务辟商务说》。

④郑观应：《盛世危言》卷1，《商务》。

⑤郑观应：《盛世危言》卷1，《商务》。

为农之虎狼而已”。①王韬在这里讲的确实是封建社会中的真实面貌，那些“重农抑商”的高唱者，实际是发展农业生产的虎狼。推行“重农抑商”的结果，使“山多宝藏不能兴也，水多货财不能殖也，道途跋涉舟车空也，城廓倾颓登凭寂也，官府豺狼民侧目也，厘米贼盗贼裹足也，衙门苞苴无忌惮也，监牢地狱绝祥刑也”。②结果弄得“国体弱则外侮生。”③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小农经济思想的批判更为深入。他们在许多论著中指出“以农立国”是中国几千年来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各国的一大病根，而且人们思想的保守、文化的落后、各种愚昧主义的盛行都根源于小农经济之中。因此，他们明确提出中国应“定为工国。”康有为对光绪皇帝说：“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国尚以其农国守旧愚民之治与之竞不亦慎乎！”④

应当指出，改良主义者虽然反对“重农抑商”，但并非不主张大力发展农业。他们认为，发展农业的关键是要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象西方各国那样采用机器生产。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一书中就大力赞美西方各国发展农业的迅速，他说：“其妙者，农部有专官，农功有专学，朝得一法，暮已遍行于民间。何国有良规，则至相仿效，必底于成而后已。民心之不明，以官牖之，民力之不足，以官辅之，民情

①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2，《兴利》。

②③何启、胡礼垣：《新政真注》二编，《新政论议》。

④康有为：《请励工艺奖创新折》，《戊戌奏稿》第20页。

之不便，以官除之。此所以千耦其耘，比户可封也。”①陈炽更建议清政府放弃传统的方法，应效法西方，立农会，讲农学，兴农政，达到以商促农。康有为则提出工农业并举，以机器促进农业发展，并具体描绘了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的农业的画图。

“重农抑商”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一贯政策，改良主义者敢在这方面向封建制度提出挑战，是值得称许的。

五、批判封建的科举制度，要求兴办各种新式教育， 破格选拔各种人才。

改良主义者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王韬说：“人才者，国势之所系也。国家之有人才，犹人身之有精神。”②郑观应也指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③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不仅大力呼吁人才的重要，而且亲自办学校，执教鞭，献身于教育事业，严复的大半生就是在天津水师学堂渡过的。但是，改良主义者所指的人才熟悉发达的资本主义文化，可以使中国富国强兵的各种真才，并非那些为皇帝服务的无所作为的封建奴才。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们对培养封建奴才的科举制度和清朝特有的赤裸裸让人们行私舞弊的捐官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冯桂芬认为科举取士“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那些举人、进士大都是

①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农功》。

②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7，《代上苏抚李宫保书》。

③郑观应：《盛世危言》卷1，《学校》上。

“亡命之徒”，“寡廉鲜耻，坏法乱纪”的败类，这只能“有害于士，无利于国”。①郑观应指出，科举制度“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中国文试而不废诗文，武试而不废弓矢，……以此而言富强，是欲南辕而北辙耳！”②王韬进一步指出：“今国家取士，三年而登之贤书，升之大廷，称之曰翰林，以为天下人才在是矣，不知所试者时文耳，非内圣外王之学也，非治国经野之道也，非强兵富民之略也，率天下之人才而出于无用者，正坐此耳！”③与此同时，他们还揭露了清政府靠官吏举荐人才的弊病，郑观应说：朝廷“屡诏中外大臣，保举人才，然所谓大臣者，分高位崇，与下民隔绝，虽有奇杰异能之士，安得而知，何从而发？日夕所接者，下僚狎客而已，僚客未必有才也。所习者私亲秘友而已，亲友未必有才也。不得已而应诏，亦推学一二有交之显宦，或庸儒无能之辈以塞责而已，何曾保一岩穴隐遯之真才哉！以中国天下之大，人文之盛，何在无才，或淹没不彰，或名山终老，苟科名蹭蹬，则不得一伸其志者，皆科目害之耳。”④何启、胡礼垣则大胆地对清朝的捐官制度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鬻爵卖官，乃弊政中之至弊，”欲取真才，“非先废捐纳不可。”⑤戊戌变法时期康、梁等人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尤为深刻。康有为认

①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改会试议》、《改科举议》。

②郑观应：《盛世危言》卷1，《考试》上、下。

③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1，《原才》。

④郑观应：《盛世危言》卷1，《考试》上。

⑤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二编，《新政论议》。

为八股取士是封建统治者愚弄人民的工具，并把废八股作为变法的重要一环。梁启超则把科举制度痛斥为庸人学士猎取功名的手段，他揭露在科举制度上建立的官制极为黑暗，形成“习非所用，用非所习”；“一官数人，一人数官，牵制推诿，一事不举，保奖蒙混，鬻爵充塞，朝为市侩，夕登显秩。”①谭嗣同更为愤怒地指出：“地球上不论何国，但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命为礼义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严复在《救亡决论》中对八股取士的抨击尤为严厉，他说：“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

综合改良主义者的这些论述，他们是要说明原有的封建社会的一套选举人才办法已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人才。为此，他们在批判这些封建旧教条的过程中，又具体阐明了对立于科举制度的一套旨在培养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人才的各种方法。

其一曰，兴教育。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母机，也是传播思想的阵地，任何社会变革如果没有教育作基础，最终要流于失败。改良主义者十分清楚这个道理。郑观应说：“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②何启、胡礼垣说：“一国之人才，视乎学校，学校隘，则人才乏，学校广，则人才多，”中国学校少，所以人才缺，如果“立中国

①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第3页。

②郑观应：《盛世危言》卷1，《学校》、《考试》上。

于不败之地，则必先有能立中国于不败之人乃可，此非宏学校不能也。”①马建忠则明确提出“练将之法自学院始。”

“一曰分设小学以广收罗。……二曰设立大学院以专造就。”

②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也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③康有为还具体提出了要在全中国广设大学、中学、小学，尤其要办天文、地理、化学、电学、医学、光学、矿学、机器学等各种专门学堂。在十九世纪末年的中国，新式学堂的是个新鲜事物，当时虽设立了几个如福州航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式的学习自然科学的洋学堂，但都受到了顽固派的种种责难，以至各种专门学堂很难兴办。所以，改良主义者在这里为大办学堂的呼喊，不仅是培养各种专门人才的需要，也是对传统的封建理学正统思想的挑战。

其二曰，破资格。资历深浅是封建社会用人的重要标准之一。清王朝建立后更注重资历，凡选官吏，论资排辈。所以用人唯资是当时压制人才的最恶劣的手段。早在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就对此作过深刻的揭露。他指出，清朝的读书人一般三十来岁进入官场，到当上大官时要熬上三十多年，那时牙齿掉光了，头发白了，精神不振了，同时怕丢官而畏缩不前，玩物丧志，但又不肯退位，“仕久而恋其籍，年高

①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二编，《新政论议》。

②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3，《上李伯相复议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

③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第126页。

而顾其子孙。”即使偶然退位后，那些真正有才能的人也因资历浅而选不上来，这正如俗话说：“新官忙碌石呆子，旧官快活石狮子”。^①因此龚自珍大声疾呼要“不拘一格降人才”。早期改良主义者继承了龚自珍的思想，提出了“人人皆可以为官”^②的口号，去对抗清政府的用人唯资。郑观应提出，在考试中要“量其才而不拘资格，精其选而不必定额数。即使制艺为祖宗成法，未便更张，亦须令以制艺之外，习一有用之学，或天文或地理，或算学或富强之事，苟能精通制艺，呈不甚佳，亦必取中。如制艺之外，一无所长，呈文字极优，亦置孙山之外。”^③王韬指出：“人才既拘于资格，则不问其才否，外而郡邑诸吏上下其手，颠倒是非，官一切不能问，曰非是且遭驳斥。持守愈固，蒙蔽愈深，厥病曰痼。”^④他反复强调，选才要“勿限于门节，勿拘于资格，毋拘情私，毋存轻藐，有能干者立予拔擢，将一奖而百奋，人才自出矣。”^⑤梁启超等对封建社会论资排辈的现象深恶痛绝，他们把这种状况斥之为误国病民的根源，并提出“变法”先“变人”的主张，要求清政府破格起用革新人才。他们严正指出，如果靠这些顽固腐朽的老官僚变法，这只是一句空话。

概而言之，改良主义者从实现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

①《龚自珍全集》，《明良论三》。

②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二编《新政论议》。

③郑观应：《盛世危言》卷1，《考试》上。

④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7，《代上苏抚李宫保书》。

⑤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2，《拟上当事书》。

业、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这个政治目的出发，提出了一套选拔培养人才的办法。这些主张深深烙有资产阶级的印记，又大大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中的人才使用，所以和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选择人才的方法针锋相对。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从一个方面揭了封建旧制度的疮疤。

结 束 语

改良主义者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前后持续三十年来。他们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封建顽固势力、封建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还尖锐地抨击了洋务集团。从而促使了中国人民的觉醒，迎来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是极不彻底的。他们虽然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但对封建皇帝的权力和地位仍是维护的，他们同封建统治者也不是根本对立的。他们批判了封建礼教，但在他们的思想还保留不少封建主义的毒素。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封建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他们没有坚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作基础，没有从人民群众中寻找支持力量，所以他们还经不起封建顽固势力的反扑而败下阵来。他们向封建专制主义作了斗争，但远远没有完成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使命。致使封建专制主义还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政治生活里散发着冲天的臭气。因此，埋葬封建专制主义的光荣使命，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肩头了。